

# 截面与回声

——《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读记

■ 陈爱中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颇为坎坷。经典作家的研究近乎停滞,鲜有突破性成果,依靠经典作家周边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毕,需要有新的研究视角或者阐释方法以延伸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既然阐述或者评论逐渐孱弱或者说陷入窘境,那么与之相关的史料学的研究自然是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的重心,史料的不断完善为另一个研究高峰的出现提供前提,是评述性、思想性的学术研究遇到困境时的缓冲。对现代文学来说,史料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原初性史料,比如经典作品的原初发表刊物、文本形成的过程,以及作品的完整性考证,等等;另一种史料则是属于研究历史,或者说是阅读研究史一类的史料,是系统观照一个研究对象被阐释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料留存。由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赵思运、蔺春华主编的《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的出版,与此前的《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构成一个序列,在对经典作家研究的史料留存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茅盾研究年鉴(2016—

2017)》由四编组成,分别为“茅盾研究大事记”“重要论文”“论著评价”和“论文索引”。从命名上可以透视出编选者秉持的尽可能客观和中性的学术态度。

第一编简要叙述两年之中,和茅盾研究相关的“大事”,包括茅盾研究专家查国华教授、钱谷融教授、曹万生教授的去世,中国茅盾研究学会的人事更迭,“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系列活动,等等。从大事记来看,这两年的茅盾研究缺少核心事件,多为关联性的外围事件,没有重要文献的发现和研究观点的凸显。

第二编的“重要论文”和第三编的“论著评价”显然是该年鉴的着力重点。共收论文34篇,著作6部。论文部分增加了编选者的基本判断,细分为“论衡”“重估”和“史料”三部分。这里用“史料”,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确定的历史资料,而是略带资料考证性质的评说,是对史料的使用和评述。细读入选的这些论著,大多围绕茅盾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论述,比如围绕《子夜》的文章就有五篇。应该说《子夜》的研究作为经典作品中的重点,对其的阐释

已经比较充分了,作品的基本元素基本达成共识,后来的研究多为“修补性”的研究。葛飞的《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从读者阅读趣味的角度解释了小说中出现的情色描写的原因,并从雅俗共赏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子夜》的语言风格。赵丹的论文《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确定性论述《子夜》的民族工业化主题,将《子夜》视为反映社会经济真实的一个文本,研究方法独特,在进一步夯实《子夜》的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印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子夜》作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基于茅盾作品文本之内的研究已经充分,甚至有过度阐释的嫌疑,那么“文本之外”的关联性研究,则是说话茅盾的重要抓手。这也是这几年茅盾研究的重点,因此就有了钟海波的《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编辑活动》、李玲的《茅盾社会进步视野下的妇女解放理论》、夏春锦的《木心与茅盾》,等等。钟桂松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则从作家成长的角度,详细考察了茅



《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  
赵思运、蔺春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盾离开北京大学到商务印书馆之后的文学活动,还原了一个文学活动家、翻译家的茅盾,也为后期的文学创作作了丰富的社会学的积累。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则开拓了茅盾研究的视野,吕周聚的《论茅盾与美国左翼文学之关系》,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文学活动等方面考察茅盾的创作与美国左翼文学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茅盾“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美国左翼文学,而是学习借鉴其精华,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其作品在题材、内容、主题等方面与美国左翼文学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等方面与美国文学之间具有诸多相通之处,这正是茅盾的高明之处。正因如此,茅盾创作的《子夜》等左翼文学作品不仅与当时的苏联左翼文学及国内的左翼文学有所不同,而且与美国的左翼文学也有

所不同,这充分地体现出茅盾对中国左翼文学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这种观点是对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域外支撑资源的补充,也是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茅盾作品的生成元素。张岩则从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与北欧神话的关系出发,重新考量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茅盾对西方神话的翻译和研究成果的角度寻找“命运女神”精神的发展轨迹。当然,从这部年鉴的内容来看,也表露出近年茅盾研究的遗憾,那就是茅盾作品的社会性、文化性研究依然兴盛,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野并没有本质性的突破,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依然是主流。而作为文学家的茅盾,其作品的文学意味、虚构性和想象性的成分的研究依然薄弱。

总体来看,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年鉴,《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坚持年鉴的资料性,重要论著的全文选编和索引的编写,基本上囊括了这两年茅盾研究的资料性文献,也适当兼顾对特定时期的研究成果的评述。其编辑体例的不断完善、视野的不断开阔和编选队伍的专业化,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对各种社会资源和专业资源的良好组合,为年鉴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保证。《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虽为学术史的一个截面,但它会在绵延的学术长河里不断地激起回声。

(上接第二版)

最初和黄德海他们讨论,希望作家们用诗的形式来表现神话故事,但几个年轻人拖了两个月没有动手。我有些惊讶,他们均是下笔如神的好手,为何如此拖沓?再次讨论时,他们如实说出观点,研究了中外各种史诗,觉得要把这么复杂的故事用诗讲清楚,实在为难。他们认为,首度创作,用散文的笔法书写,效果或许更好。他们说得有理有据,让我折服。三位作家深思熟虑后的认知,后来被证明极为正确。他们撰写的散文故事,与施大畏等画家的作品相得益彰,结集成图文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推出后获得众多好评,成为创世神话多种文艺创作的母本。在此基础上,上海作家协会组织诗人进行史诗创作,多位诗人合作的精彩史诗业已问世,并与交响乐团合作推出交响史诗,演出十分成功。这说明创作自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图文本的同时,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做了英文本。英文本的文字部分,是按照三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请海外学者翻译,图版方面,按照海外读者的审美习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同样获得很大的成功,立刻转售了波兰文本和捷克文本的版权,就是证明。至于波兰文本出版伊始,就有两篇故事被选进波兰的小学教材,则是出乎意料的喜讯。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中国作家的文章进入海外非中文国家的教材,是罕见的。

顺便说一下,三位青年作家的合著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三分之二的篇幅是用第三人称叙述,唯独最后的部分,写大禹的那些篇章,用了第一人称,按照现在时髦的语言,似乎让大禹作了长篇的“个人独白”。起初,我对此犹豫不决,因为不符合一般的编辑习惯,同一本书风格为啥如

此不统一?反复讨论之后,尊重了作家们的想法。一来,这些故事相对独立,变换人称,不影响阅读;其次,大禹是创世神话中的重头戏,内容相当丰富,用第一人称,更可以细微地模拟祖先的内心世界,不妨大胆一试。我想,创作应该允许认真研判后的标新立异。文本出版后,读者对这样的形式并无异议,证明深思熟虑基础上的“独创”是受欢迎的。

## 思想碰撞是项目发展的良性推力

前面说过,本项目最初的灵感来自施大畏的作品《盘古开天》,毫无疑问,美术创作是酝酿“创世神话”项目的原初动力。当时,我们讨论西方创世神话的发展过程,寻找相关的各种文化资料,直观发现,大量集中于教堂等处的油画和雕塑,是它得以深入社会人心的基础,是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根基,我们的创世神话项目,在美术创作的布局上,不但要有油画、雕塑部分,更要注重国画的表现力,还要兼顾各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即便是雕塑,现在年轻人对西方的雕塑作品知道得多,其实,中国雕塑在2000多年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其对抽象语言的运用,远远早于西方艺术。

作为项目核心部分的美术创作,起步阶段不太顺利,多次请美术家们开会研讨,议论纷繁,顾虑不少,事情徘徊不前。现在回忆,我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一直强调创世神话人物造型统一公认的重要性。从表面看无可非议,实际上束缚了艺术家们创造的主体积极性。我希望施大畏集中精力组织力量,搞七八位比较公认的人物造型出来,然后再全面铺开美术创作。施大畏对于我的固执实际上不太赞同,但他

确实着力推进了,画院的中青年画家们把各种能够寻找到的神话人物造型全部集中起来,并且群策群力初步创作出一批造型,供画家们研讨。

经验丰富的画家们,表达出令人佩服的真知灼见。在反复讨论中,有人指出,孙悟空的人物造型也是有很多次反复的,不但艺术家们有各种想法,普通读者、观众的贡献也很多,按照现在的说法,是长期互动才磨出了公认的造型。反复的研讨使我认识到,期望立马就能搞出一批公认造型的想法,是幼稚的,不符合创作的规律。

这时候,施大畏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先不搞大型创作了,先着手连环画绘本。他的理由是,让画家们百花齐放,接赵昌平等学者的学术研究,加上自己对神话的认知,放开手脚创作连环画绘本。几十本连环画,即使风格大相迥异也没有关系,因为连环画绘本出手快,成本比较低,能够马上进入社会,听取公众意见,实现互动。施大畏的想法得到多数画家的赞同,创作终于启动了。正如施大畏的设想,连环画最初的一批绘本问世,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对创世神话项目走入公众视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画家们拿着绘本去学校听取孩子们的意见,又在“中华艺术宫”搞了一次孩子们心中的神话人物的美术比赛,凡此种种,为创世神话的大型美术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各类艺术创造,在思维上具有不同的侧重。本项目中,学术、文学、美术三个专业,对同一内容,有时想法迥异,未免交流碰撞,偶尔争论激烈,促发思想的火花,看似脸红耳赤,有伤和气,其实,对项目的深入发展,是良性的推力。画家们曾表示,学术文本难懂,有些部分考证出多种释义,会给美术创作设置障碍。具体是什么意见呢?一项项谈出来,情况就清晰了。比方

说,神话人物,在学术考证中,可以详述各种版本的记载,甚至包容矛盾冲突的说法。像尧帝有几个女儿,某个战事到底发生在什么区域,答案不尽相同。画家怎么办?总不能前面和后面画出两种模式。这个问题,后来吵明白了。学术考证必须寻根究底,不回避典籍中的多种记录,但画家的创作不要求面面俱到,一本连环画,一幅大画,自身统一即可。有的画家还谈起创作中的苦恼。女娲是人类之母,希望描绘出她高贵美丽的形象,但是典籍中记载的“人身蛇尾”,使创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仅仅是女娲的形象创作,做一点虚幻的艺术处理还勉强可行,问题在于,半兽半人的形象几乎是神话传说中的多数,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如何在艺术创造中逐一实现,是很大的难题。美术家们提出的疑难,在文学文本里可以含糊,用诗化的语言能够处理,但是,以形象为主的表现形式,确实难以回避。

在几次思想碰撞之后,赵昌平仔细考虑了画家们的疑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神话人物半人半兽(或者说半人半神)确实是典籍的普遍记载,但是,我们今天不妨重新认识此类传说,所谓的“兽形”,也可以理解为当时的图腾崇拜,未必一定要具体画出“兽”与人身的结合。他的解释引发了画家们浓郁的研究兴趣,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热情地议论开来。

学术一丝不苟的考证,文学妙笔生花的演绎,美术天马行空的挥洒,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项目的开拓中,经历矛盾和磨合,最后友好地携手共进。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已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期封面选自“中华创世神话”之连环画绘本《大禹出山》,作者梁川。)